十日谈 清明的回忆

忆程乃珊先生

贺友直 文/图

乃珊先生离去一个周年了!人一旦离去,不知怎的,时间过得特快。

我与乃珊先生本不相识,交往的缘由从一本《上海FASHION》开始。乃珊先生写的这本书,并非写一个故事,而是由大大小小三十多个故事合成往日上海的风貌,这类内容若是配上插图会更加好看,于是出版社的编辑找到了我,要我为这本作品配画插图,作家和出版社相中我当然乐意,于是由编辑领我登门,初会乃珊先生,感觉平和友善,是位易于交往的人。

我们的合作有点特别,是等米下锅式的,她写好几篇文字交我配几幅画。我读过她写的内容,其中涉及的生活我没经历过,因为我出身在上海社会的底层,而她所写的内容事物场景未曾目睹,更谈不上亲历,画这类插图依何为据从哪入手?为此,我提出主张:依你写的主题,由我发挥。画插图不同于连环画,只要主题相符,不必拘泥于情节故事。她处事很放得开,允我离题,所以才画出这三十几幅插图。例如"冰淇淋",我未见过更未尝过,就画了一个穷孩子捧了一只盛装机制冰的水果铺飞奔,叫卖:"冷饮哦卖冰哦!"这冰块盛在碗里加醋放糖在穷人嘴里也可等同冰淇淋。又如"旗袍"一则,这在旧时,凡女人无论老中青多穿旗袍,为求有点意思,我画一个侧身的少妇,该突出的尽显其女性的诱人处——性感。尤其在画的女人的腋下旗袍钮扣处穿了一方手绢,在画上题了一句"羡煞轻薄儿",这样处理既不离题岂不是更有意思?书出版后,乃珊先生对插图感到满意认为是一次融洽的合作。

乃珊先生是浙江桐乡人,乌镇孔令境先生的纪念馆落成开馆,她当然被邀,我也有幸参加,然而在前年纪念馆落成五周年纪念活动时,我去了却不见她的身影,怎会缺了她呢?一问,说是身体不好,我猜想,不过是伤风咳嗽头痛脑热的小毛病吧。不料,过不多久听说患的是绝症,却又在报上登载她被聘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的消息,正为她庆幸之际又是报纸发出她去世的讣告。骤闻之下,太感意外。作为作家,她正进入成熟期,精力能力的旺盛期,可是天不赐寿,上海又失去了一位有成就有前途的女作家!

我的印象,程乃珊在哪,哪里就有笑语声,而今,一只角落寞了。

时代船头的瞭望者

陈歆耕

近期空暇一直在读作家陈启文的报告文学新著《命脉——中国水利调查》。这部书够沉重的,沉重不仅仅因为长达60多万字,将近600页,更因为书中提出的问题,时时让人在阅读中感到太沉重。许久没有读到如此有沉重感的报告文学了。报告文学的文体特征,似乎就应该远离"轻阅读",它与娱乐、调侃、搞笑几乎无缘。因此,这类文本,即使优秀作品也与当下流行的时尚相背离,是让人一点也不感到奇怪的。想起优秀报告文学名篇《绞刑架下的报告》,你能笑得起来吗?

还是在一年前,就知道作者正在写作这部书。他的野心够大的,要把影响整个中国生存的"命脉"——水利的历史和现状,做一个全面的梳理、考察和调查。这里涉及到中国大陆所有江河湖泊,从黄河、长江、淮河、海河到大运河等等各大水系。想想看,要对这些水系做一个全面的田野式的考察、调查研究,需要多大的工作量?需要付出多么艰辛的劳作?在这么一个生活、时间碎片化的时代,要做这么一项调查,只要想想,就让人生畏。陈启文用三年时间,终于完成了他的调查和写作,仅从这一点就让我心生敬畏。从书中,我时时读到他身心疲惫的感觉,如在很多处,作者下意识地流露出类似的语汇:"在接近知天命之年时,我走向……",等等,让我眼前时时晃动着那个背着行囊,跋涉在江河湖畔的中年汉子身影。他几乎是在用一种殉道者的精神在做这件事。当然,也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近乎殉道者的精神支撑,在接近"知天命之年"时,陈启文还能将这项调查坚持下去,并结出果实来。

有论者将这种精神称之为"忧患意识",或者说是"危机意识"。我认为,这部报告文学具有三重价值,一是生存地理意义上的;二是自然地理意义上的;三是人文地理意义上的。而最重要的价值,当然是涉及人类生存意义上的部分内容:对中国"水危机"的揭示。那些对古今各种水利工程利弊得失的夹叙夹议的分析,那些对因利欲过度膨胀而带来的严重污染图景的呈现,无不让人感到触目惊心。有西方研究水生态的人士提出危险的警告:"二十年后,中国将找不到可饮用的水资源。"如果有人读了这样的文字还无动于衷,我只能说,大概大脑神经已经被酒精深度麻醉了。在读这本书时,有关长江入海口和黄浦江水质状况的文字,我读得特别仔细,因为我非常想了解自己每天喝的都是什么样的水,它从哪儿来?我确实从这里读到了我关心的东西,获得了过去闻所未闻的有关上海这座城市水资源状况的资讯。也因乎此,我要改变自己过去拧开水龙头,任其哗哗流淌的不良习惯。在洗浴时,也得尽量缩短时间,因为从这部书中我知道了,地处长江入海口的上海,同样也是一座"缺水"的城市。书中写道:"上海缺的不是水,而是干净水。""北京是典型的水源型缺水城市,而上海则是典型的水质型缺水城市。"

限于篇幅,我不想再谈这部书的自然、人文地理上的意义。其实,报告文学作家的使命,更接近于职业的新闻工作者。新闻的价值和文学的价值,在某些地方是很难截然划分的。乔治·奥维尔就把新闻也纳入广义上的文学范畴。记得美国独立报业的创始人、普利策新闻文学奖的设立者约瑟夫·普利策,对新闻记者的职能说过一段非常形象而精彩的话:"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告。"

为了我们的家园能够可持续生存,我们需要更多像陈启文这样的"时代船头的瞭望者"。

得意的花泥

释成嗔

茅山的植物有不少种类。山顶附近一处地方的花木生长得特别茂盛,那里土壤的颜色也比较特殊,是淡紫色的。智缘师父说,那里的花草之所以茂盛,就是和这种富含养分的泥土有关。有时寺里准备栽种新的花草,戒嗔便会和戒傲一起去山顶附近挖一些泥土回来。

有一次,戒嗔去挖土的时候,忽然发现地上有一个不大不小的坑,看泥土的颜色应该是新挖的。戒嗔感到有些疑惑,因为茅山上除了我们没有其他的住户。戒傲说,难道是野兽挖出的坑?可是细看又不像野兽挖的坑。我们不由得猜测,可能是和智缘师父有着同样爱好的施主不辞辛劳地上山来挖泥后留下的坑吧?

戒嗔左思右想也没有答案,但也没有特别在意这事。那段时间戒嗔每隔几天就能看到地上有挖过的痕迹,心想这家人养的花还真不少。

有一天清晨,戒嗔在寺门外看到淼镇里相熟的吴施主从山上下来。戒嗔上前去打招呼,看见吴施主手中拎着一个塑料袋,里面居然是紫色的泥土。

戒嗔恍然大悟,原来这些天在山上挖泥的正是吴施主。

戒嗔好奇地问吴施主大清早挖泥做什么?吴施主笑着说,这些泥土是用来捏泥娃娃的。原来吴施主在宝光寺附近有一个卖旅游工艺品的小摊位,专门卖这种泥娃娃。由于其他施主所卖的工艺品都是工厂里生产的,样式都是大同小异,所以吴施主这种用特殊颜色的土捏出的泥娃娃非常畅销。

戒嗔下午和戒傲谈起吴施主做泥娃娃的事情,戒傲算了一下,只需要几盆我们平时种花用的泥,吴施主就能捏出价值几百元甚至上千元的泥娃娃。大家都觉得吴施主很厉害,把泥土的价值发挥到了最大。

有一天,戒嗔和戒傲去宝光寺,经过附近的工艺品摊点时,远远地就看见了吴施主的摊位。我们去和吴施主打了个招呼,然后站在摊位前欣赏吴施主制作的泥娃娃。

吴施主的手艺相当了得,每个摆放在摊位上的泥娃娃都是笑呵呵的。想到前几日这些泥娃娃还不过是不起眼的泥土,戒嗔和戒傲心中不禁暗自赞叹。

就在这个时候,旁边忽然跑来一只小狗,看体形比戒言还要胖些。小狗从吴施主的摊子前跑过,不小心撞到了桌子腿,摊子倒了下来,上面的娃娃一个个落在地上,有几个当场就裂成了两半。

吴施主把那些完好的泥娃娃捡起来,重新摆放在摊位上,那些破损的泥娃娃便扔到了角落里。

吴施主说,这些泥娃娃曾经加工了一次,现在破损了,不但不可能再还原成泥娃娃,连做花泥也不适合了,所以只能扔掉。

戒嗔想,同样是出自茅山的紫色泥土,命运却是大相径庭。有些安分地做了花泥,有些变成泥娃娃,得意地站在摊位上,但无论怎么变化,它们的本质依然是泥土。

其实人也一样,有时候差不多的人,因为机缘不同,人生便会有很大不同。所以,如果我们因机缘巧合能站在高处,也不应该扬扬自得,当我们开始忘形,下一刻便可能什么都不是。

山不在高 (中国画) 沈三草

无罪于……

陆其国

一所大学办得如何,校长的作为无疑是关键。梅贻琦与清华大学的结缘,即可证明这一点。

自1915年时年26岁的梅贻琦应清华校长周诒春之聘至母校任教,从此与清华的联系再也没有断过。1928年清华学校正式改制为国立清华大学,教授会选举时,梅贻琦在47张有效票中获得33票,成为清华第一任教务长。之后在清华学生三拒校长的风潮中,平时沉默寡言的梅贻琦被推举上位。

梅贻琦上位后有权但不揽权。在清华的教授评议会上,只要教授们提出的建议有利于清华发展,梅贻琦无不赞同,谓之"吾从众"。正因为梅贻琦执掌清华有方,加上一干教授们给力,清华终于从一个原先虽有名气,却无学术地位的留美预备学校,得以蒸蒸日上,跻身于名牌大学之列。对此,曾长期担任清华文学院院长的冯友兰盛赞梅贻琦具有当校长的本领。更有论者觉得,这本领即体现在梅所说的"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如何耳"。

而最考验梅贻琦这方面能力的,当数1937年抗战爆发,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先搬于长沙,后迁至昆明由临时大学而组成西南联合大学之际。这时候虽有蒋梦麟、张伯苓、梅贻琦三校校长担任常委主事,但堪称梅前辈的蒋、张二人多数时间在重庆参政,西南联大则多由梅贻琦主持日常校务。此时大家突然发现,以前遇事谨慎,从不轻率发表意见的梅贻琦,处事变得异常果断。创建于国难时期的西南联大八九年间人才辈出,显然和梅校长心中装着联大,以及清楚自己对联大的担责分不开。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他心中没有清华。须知此际梅贻琦曾经说过这样一番话:"在这风雨飘摇之秋,清华正好像一条船,漂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负驾驶它的责任。此人必不应退怯,必不应畏缩,只有鼓起勇气,坚忍前进。"

1931年,一度出国回到国内的梅贻琦出任清华大学校长时,在"就职演说"中讲过这样一段话:"本人能够回到清华,当然是极高兴、极快慰的事。可是想到责任之重大,诚恐不能胜任,所以一再请辞,无奈政府方面,不能邀准,而且本人与清华已有十余年的关系,又享受过清华留学的利益,则为清华服务,乃是应尽的义务,所以只得勉力去做,但求能够尽自己的心力,为清华谋相当的发展,将来可告无罪于清华足矣。"梅贻琦为什么能够把西南联大,把清华办得如此风生水起,青史留名,原来这一切全缘于他内心有着警醒的自省意识,即"将来可告无罪于清华"。

显然,梅贻琦对于"罪"的认识,其分量已远远超过了泛泛言之的担责。在他看来,一个人担责却不尽责,实无异于犯罪。

正因为内心有这样的意识和警觉,梅贻琦才能够在几度临危受命、知难而进的情况下,将西南联大和清华办得有口皆碑。其实梅贻琦夫子之道的"无罪于……"这句话,实在应该让今天每一个在不同岗位和领域担责的人反躬自省、扪心自问:我今天的担责,是否能够做到"将来可告无罪于……"?

饭店里的边角料

——城隍庙忆旧之三

秦来来

改革开放以前,上海的粮油供应是按人、按月定量配给的。那时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一个月26斤的定量无论如何是不够吃的,总希望能多点油水,来弥补米面的缺乏。可是,每个月只有半斤的食油配给,显然无法满足一个月的使用。因为粮食不足,希望多点油水;因为没有油水,更显粮食不够。

俗话说,"活人不能让尿给憋死",生活在城隍庙附近的人,总有办法使困难低头。

城隍庙里原有一家"松运楼菜馆"。它的位置南向文昌路、北临荷花池,门面向东南角而开(现今被绿波廊酒楼所居),"文革"中改名"永红饮食店"。它以点心、小吃为特色,兼带供应酒菜,主要突出苏、浙、沪菜系。

住在城隍庙的人,有时会去吃吃点心、打打牙祭,发现它供应的菜肴当中,有一只名叫"豆腐汤"的,特别实惠。细究起来,它实际是一个大杂烩,主要作料是鸡、鸭、鱼、肉的下脚料构成,像什么鸡胗、鸭胗、鸡鸭肠,猪肚、门腔、猪头肉……再加上一点豆腐。等到端上台面,雪白的豆腐、青翠的蒜叶,特别是那厚厚的一层油水,令人垂涎欲滴。虽然要价一毛五分,价格不菲,可是物有所值,性价比高,所以受到了我们左邻右舍的欢迎。

当然,我们是绝不会坐到堂口里点一份"豆腐汤"来消费,那样太奢侈。我们会拿起家里的钢精锅,几个人一起,去到松运楼,每家买一个"豆腐汤",不用店里的碗,而用我们带去的锅来装。

买回来以后,我们也决不会就这样把它吃掉,而是把它一分为二,中午和晚上各一半。然后再把各种素菜,或青菜、或白菜、或毛菜杂七杂八地放进去,利用它的油水来煮菜,满满的一锅,一家人连汤带水吃上一顿。

城隍庙正门进来,右首第一家是有名的"老桐春"点心店,它的各色汤团、酒酿圆子,有口皆碑。可是街坊们的目光,集中在它供应的"广式春卷"上。所谓"广式春卷",与上海春卷的不同在于,用湿稠的面粉打浆以后,涂抹在包好的春卷外面,然后再下锅油炸。湿稠的面浆经过油炸以后,迅速发泡,显得又胖又大。煎完以后,待沥干油后,就可上桌供人食用。

但我们不会去买它的春卷,而是等到下午四点半以后,城隍庙里的游客稀少了、没有了,这家店里会把沥干油的春卷粒屑,用纸袋包装以后,以五分、一毛一包出售,我们邻居们就会去买这些春卷粒屑。干什么?也是买它的"油",因为这些"粒屑"里饱含油水,买回家以后,也会配以各种素菜,煮烧菜肴,以弥补油水的不足。